

## 德国的“世界解读者”在何处？

大卫·勃索尔特（**DAVID BOSOLD**）

并不仅仅是无关紧要的损害

威尔福里德·冯·布雷多夫（**Wilfried von Bredow**）

战争永远违反国际法

格哈德·富尔达（Gerhard Fulda）

被审判的地狱

托马斯·古奇科（Thomas Gutschker）

以牺牲大众为代价培养精英？

亲爱的读者：

教育是二十一世纪的核心资源。它不仅决定着个人的成功与否也同样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成败。

但教育远远不只是取得经济成功的手段。早在二百年前亚历山大·冯·洪堡就知道：教育是使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它赋予人们了解世界并在永无终结的进程中不断反思的能力。

可惜当今世界还存在着巨大的“教育漏洞”。在许多贫穷国家成千上百万人连小学教育的门槛都迈不进。即便在较为富裕的北半球，我们也感到，要想与日渐迅速循环的创新和适应保持同步也越来越难了。

现代社会应该如何开展教育？怎样才能使整个地区消灭教育赤字，以符合全球化的知识社会的要求？这些问题正是本期“国际政治”杂志所关注的。

我祝各位阅读愉快！

德国驻华大使馆

新闻处处长 文墨

## 目录

|   |    |
|---|----|
| 德国的“世界解读者”在何处？<br>大卫·勃索尔特 ( <i>DAVID BOSOLD</i> ) -----           | 4  |
| 并不仅仅是无关紧要的损害<br>威尔福里德·冯·布雷多夫 ( <i>Wilfried von Bredow</i> ) ----- | 9  |
| 战争永远违反国际法<br>格哈德·富尔达 ( <i>Gerhard Fulda</i> ) -----               | 17 |
| 被审判的地狱<br>托马斯·古奇科 ( <i>Thomas Gutschker</i> ) -----               | 22 |
| 以牺牲大众为代价培养精英？ -----   | 31 |

## 德国的“世界解读者”在何处？

遗憾的是通常在国外……

大卫·勃索尔特 (David Bosold): 从人才外流到人才引进: 如何才能不让越来越多的德国大学生和科学家流失到国外? 作为科学国度来说, 德国必须更具吸引力, 为此, 必须优化学习内容, 提供更好的服务器以及增加改善工作条件的投资, 包括面向外国人。

1968年秋天, 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主席的赫尔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抱怨说, 德国大学培养的社会学家太多了。他警告说, 德国需要“能够以符合时代要求的形式从事社会急需的真正职业”的人。四十年后的今天, 施密特的话不再适用, 现在, 社会需要的是拥有扎实外交知识和有关世界各地知识的高校毕业生。更有甚者, 鉴于对外交政策专家的需求, 延·罗斯 (Jan Ross) 在“时代”周报上撰文写道, 目前正在“绝望地寻找世界解读者”。德国专家都到哪里去了? 还有, 如果有德国专家的话, 他们为何还没有能够让彼得·绍尔-拉图那样的老一代世界解读者功成名就地退休呢?

如果将就读高校视作成为专家的基本前提条件, 那么这本身不应是什么问题。根据联邦统计局和各高校提供的数字, 我们本不缺少“世界解读者”, 即使那些长期以来理论过于繁琐的德国大学也不能被视为人才缺乏的理由, 至少乍看上去不是如此。不过, 经常被视为大学一切弊端之源的博洛尼亚进程以及转向学士和准硕士课程, 使得我们引进了新的更加贴近实际的大学课程。无疑, 该进程并未发明什么新鲜事物,

很多时候，上述转变更象是改革的微风，而不是真正的“转变之风”。但无论如何，已经逐步扩大了现有的教学内容，例如，在国际关系领域。无论如何，从发展政策，到东南亚研究直至诸多欧盟课程都可攻读准硕士学位，这就表明可供选择的课程得到了改善。

需求形势又如何呢？如何纯粹考虑数字，形势也不错。只有极少数大学的学生对国际题目不感兴趣，大学录取比例在1比10之间，有时候甚至达到1比25，因此，恐怕谈不上需求不足。同样，也不能够说毕业生过少。在与国际议题相关的社会科学和地区科学领域，大学生人数仍然较多，确切地说，最近十年来，毕业生人数差不多翻了一番。大学毕业后，相关专业毕业生的失业率也并不明显高于其他专业毕业生的失业率，并且远低于平均失业率。因此，应当认为相关学习并不是许多人描写的并且已经沦为迂腐的通往出租汽车司机生涯的入场券。

### 体制缺陷

尽管如此，目前的体制似乎仍无力培养出符合需求的后备人才。原因何在？其中的一个原因既简单又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毕业生中有一半是所谓的接受教育的外国人。在这些人中，又有将近三分之二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我们有理由将此视作德国高等院校进一步国际化取得的成功，但却无法将其视为德国劳动力市场成功的国际化。由于官僚障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毕业生很难获得工作许可，在此，他们大多在大学毕业不久便离开了德国。如果能够将足够的德国世界解读者留在德国的话，这个问题也不会太严重。

然而，许多德国的高校毕业生离开了德国的劳动力市场，转而接受国外更具吸引力的工作。此外，越来越多的德国大学生只在外国大学中毕业，多数在荷兰，美国或者英国。如此一来，德国面临着双重的人才外流。2006年至2007年之间，根据联邦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在国外留学的德国大学生人数增加了7%，而外国学生的人数则停滞不前。2004年至2006年期间，在德国开始上大学的外国学生的比例甚至下降了10%。

如果各国之间真正进行交流的话，这一切仍将是可消化的。然而，我们既未能让那些在德国受过教育的人留下来，也没有能够说服那些留学国外的德国人回到德国。因此，联邦教育研究部（BMBF）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敲响了警钟。调查认为，必须阻止高素质人才从德国外流，“因为德国的博士生越来越多寻求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sup>1</sup>。目前，英国人数最多的攻读博士学位的外国人即为德国人。与德国高校毕业生不同的是，这些人拿到博士学位后经常留在英国工作。对于那些成为在大学中培养世界解读者的人来说，较少的行政工作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而较长的工作合同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规划自己的事业。此外，真正的中级学术力量，即教授职位之外的那些职位，使得人们能够更好也有更多时间关心照料科学后备人才，大学生和大学老师都从中获益。现在，在大西洋彼岸和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研究所里，出口热门商品不仅是大学生，科学家也非常吃香，他们占研究力量的十分之一多一点，但有时候比例差异很大，有些专业中甚至占到研究人员的将近三分之一。

对于德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这表明德国的大专院

校并不象吹毛求疵者们常常认为得那么差，问题是这些大学的教育并不成功，因为常常不能把毕业生留在德国。其实，在一个流动性越来越大的世界上，这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但必须弥补反方向的盈余，而我们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德国大学生和科学家越来越流向那些条件更好和报酬更高的地区。

正如联邦教育研究部报告所证明的那样，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些情况，并且采取了初步措施。然而，这些措施要么力度不够，要么就是方向错误，至少从为大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和为科学家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这一目标来说是这样的。补充性资金大部分流向了研究领域，例如用于杰出倡议的资金。特殊研究领域以及精英集群的短期目标是避免我们更快失去世界领先的地位（很难再谈得上赶超了），但得到改善的却不是那些决定可持续性成功的领域，即改善科研部门的学习条件，提高其吸引力。

尽管引进年轻教授以及通过聘用更多的所谓“特殊任务师资”事实上引进没有相应头衔的从事教学的教授加强了教学力量，但并没有改善教学质量。只在少数情况下才进行教学质量评估，但更主要的是即使进行评估，也不够详细，而且是为了教师在教学法上的进修。此外，这类职位对相关人员也缺少吸引力，最长六年的附期限的职位是一种巨大的职业风险，这种职位不可能无限期，因为要么你属于那些在三十来岁到将近四十岁时就能够获得真正教授资格的幸运儿，要么就会如同大多数人那样因为无谓的限期规定而无法在大学里继续工作。

那么，德国如何才能培养更多和更好的世界解读者呢？首先，必须采取弥补负盈余甚或能够将负盈余变成人才引入的措施，可以采取以下步骤。第一，应当让那些在德国受教育的外国毕业生能够更容易地留在德国工作。另外，应当增加德国作为科学所在地的吸引力，让大学生和科学家都认为德国更具吸引力。对于前者来说，解决方案在于改善大学教学内容，改善服务。对于后者来说，则是增加投资，通过培训投资于更高的质量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使得外流不再成为常态。

迈向正确方向的第一步是将精英倡议从研究领域扩大到教学领域，因为如果竞争已经不复存在，就必须加快速度。

<sup>1</sup> 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加强德国在全球知识社会中的作用，柏林，2008年，第14页。

大卫·勃索尔特（DAVID BOSOLD），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战略思维国际论坛项目主管。

## 并不仅仅是无关紧要的损害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联邦国防军撤出阿富汗是“不可想象的”，  
问题恰恰正在于此

威尔福里德·冯·布雷多夫 (Wilfried von Bredow)：袭击在增加，没有任何稳定的迹象，认为阿富汗使命已经失败的理由不胜枚举。然而，远为明智的做法则是想象撤军可能造成的后果，想象撤军可能对西方联盟，德国内政，联邦国防军以及阿富汗人民造成的后果。

“您能告诉我们是否会在阿富汗取得胜利吗？”，有人这样问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对此做出的简单回答是“不能”<sup>1</sup>。这当然不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此后，又有了对改善美国阿富汗政策的有意思的考虑。

在德国，只要暴力增加以及德国部队伤亡人数增加，公众对于阿富汗使命的认同就会面临关键性的耐受力考验。然而，如果联邦政府真正地决定将联邦国防军从阿富汗撤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对于大多数观察家和西方阿富汗政策的行为方来说，事业未竟时撤出阿富汗是难以想象的。在政治上，这个词具有多种不同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根本不可能作为一种选择”，但也可能意味着根本“不予考虑”。将这两种意思整合在一起可能产生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因为如果某些东西根本不可能作为选择，绝非意味着因此就排除对看起来不可能的东西进行思考。如果特定框架条件发生了变化，那么昨天还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就可能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经常会没有任何先兆地突

然袭击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德军驻扎在兴都库什山脉，而德国国内普遍极少考虑为什么德军驻扎在那里，它要保卫谁的安全，其后果又如何，那么有一点就将是显而易见的，即人们更不会考虑联邦国防军如果停止在兴都库什保卫德国的安全将会造成何种后果了。人们更愿意以恼怒地耸耸肩膀的方式认可有关自杀性袭击和其他袭击，对塔利班和其他反抗者及有组织和结构严密的刑事犯罪打击不力等的令人沮丧的报道。失败的事情很多：国家和行政组织的建设停滞不前，美国和北约希望借助更多士兵，更多警察，更多民事力量以及艰难达成的全面多国协议（阿富汗契约）以稳定该国局势的努力落空。有太多的计划和想法，很久以来，人们就知道国家建设的软处在哪里，但这种认识并无益处，而且现在什么都要花许多钱。

撤出阿富汗将带来深远的影响，而且是在多个政治层面上。然而，如果认为这种选择是错误的并且担心它带来的后果，就恰恰必须关注这种选择。尽管目前德国国内只有少数人要求“撤出阿富汗”，而且这些人根本没有考虑到撤出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未来几月和几年中无法在阿富汗国家建设中取得明显的进步，并且如果联邦国防军士兵的伤亡人数持续增加，那么支持撤出联邦国防军的声音就有可能汇成强大的合唱，联邦政府面临的压力将急剧上升。如果赞成撤军的人没有考虑相关要求带来的后果，而联邦政府因为觉得撤军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也没有考虑相关后果的话，支持继续在阿富汗的使命又有哪些论据呢？

如果这种选择真地得以实施，那么它将在至少五个不同的政治层

面上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世界秩序政策，对西方联盟，对德国内政，对联邦国防军这一军事组织以及对阿富汗的人民，最后一点尤为严重。

### 1、世界秩序政策

当代世界政治争论涉及一系列权力与秩序问题，这些问题密不可分，几乎不可能在“好的”与“坏的”行为体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尽管如此，有一系列人权和人道主义安全标准是世界各地都应当追求的目标，这些标准逐渐从当代西方社会产生，虽然它们在世界各个地区有着特殊的文化特点。无疑，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实现这些标准，但是由于这些标准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遏制了战争与有组织的合作暴力，因此民主国家和绝大多数生活在其他政治条件下的人们对于创造前提以更为成功地追求这些标准抱有真正的兴趣。

由于分裂的历史，国家的脆弱性以及在国际恐怖主义和有组织刑事犯罪方面扮演的角色，阿富汗并不是人权和人道主义安全意义上特别有利于重建政策的地区，然而，它现在已经成为实现上述政策的一个关键性的长期项目。如果西方和其他参与建设的国家及人道主义组织不能够赋予该项目绝对的优先性并对其予以推进，那么该项目就将失败，这样一来，促进人权和人道主义安全意义上的世界秩序政策就将遭受长期的挫折。

纵使现在只有少数观察家尚对人道主义干预的短期和中期效果抱有极高的期望，这种认识不能够也不允许导致世界政治上的无为主义，这种无为主义在纲领上，甚至带着最好的良知，对自己政治领域之外地区的穷困，窘迫和压迫毫不关心。这听上去象是纯粹的伦理论据，但它

也有实际政策的一面。如果国际体系不仅仅呈现出地区与各大洲之间在经济上的巨大差异，这本身就已经足够糟糕，其后果也已经足够严重，并且在这一巨大的经济差异之后又形成了由脆弱国家组成的区域，而且这些区域得到继续发展的话，这将对西方产生严重的危害，因为这些区域是反西方组织与网络理想的撤退和休养生息的地区。

## 2、西方联盟

多年来，跨大西洋联盟即处在过渡期。究其原因，在于全球安全形势发生了变化，根据扩展的任务特点调整军队组织，培训和装备带来的挑战以及有时候跨大西洋两岸在偏好，优先性和政治方法上的严重分歧。所有北约成员都有不同于阿富汗的“其他烦恼”。对于所有成员国来说，提供足够的军队和民事帮助都并非易事，多年来，几乎每次北约峰会都会听到要求增派部队的呼声，有时在北约峰会以外也会听到这种呼声。然而，这几乎一直是复杂的内政平衡行为，有些政府，例如荷兰和加拿大政府就很难让公众同意在战斗激烈的阿富汗地区实施军事行动。

在北约内部，德国是一个重要的出兵国，但同时也是一个极为谨慎的出兵国。如果德国撤军，但阿富汗的形势却并不会因此获得极大的稳定，并且它又难以为自己的安全承担起主要责任，这将立刻对其他北约成员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认为这一步骤有可能动摇北约的团结并导致其分裂的说法不算夸张。在较小的程度上，但同样清楚无误的是，这可能也将累及欧洲的安全与防务政策。

### 3、德国的内政

除了左翼党之外，联邦议院所有党派都同意联邦国防军出兵阿富汗，但所有这些政党中也都有批评这一决定的人。如果公众中赞成撤军者的阵营越来越强大，如果短期的绍尔-拉图加拉方丹民粹主义鼓励政治家们站在这一阵营一边，如果某些媒体将公众对德国参加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意识定位于“升天命令”和“无底深渊”，那么对于政府和支撑政府的政党以及负责任的反对派来说，就更加难以反对有关撤军的请求。除了在这一问题上始终奉行“撤出阿富汗”方针的左翼党之外，所有其他政党都将发生内部分歧，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内强烈反对军事行为的派别。

然而，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这种反军事的态度类似于八十年代早期北约双重决定之后的情况，它有可能渗透到公民阵营中去，更何况这种态度有可能以有利于联邦国防军的形象出现，因为归根结底，人们是想避免造成德国士兵更多的伤亡。这样一来，论据就将是：这也关系到不让我们自己的士兵置身此类完全没有意义的危险之中（如同从这种角度出发看上去的那样）。这样一来，就会在内政上产生所谓的和平主义者和所谓的好战者之间的极化，这将对政党政治产生深远的极化影响（在各政党之间以及各政党内部），也将对公众与政党的关系以及社会对外交与安全政策展开的普遍讨论产生深远的极化影响。

### 4、联邦国防军

联邦国防军是掌握在政治领导层手中的一个工具。在赋予联邦国防军军事任务之前，政治领导层必须极为仔细和负责地权衡目标，与之

相关的费用及实现目标的可能性。特别是必须确定联邦国防军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结束任务，何时可以离开相关国家<sup>2</sup>。

当然，这个要求容易提出，但却不易实现，因为现实条件下的军事行动总是不同于演习。士兵服从命令，但在一个注重士兵也是穿制服的公民的国家里，士兵在服从命令时是基于对做出让其参加军事行动的政治决策的信任。如果行动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中止，士兵们就会对这种可信性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种判断可能不是那么恭维的，特别是将提出下列问题，即为何要到现在而不是早些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联邦国防军离开阿富汗，却根本没有实现最初宣布的目标，此外，如果决定撤军将要产生的国际和内政后果显现出来，军方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变得疏远。但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对军事组织无益，对民主的公民社会同样无益<sup>3</sup>。

## 5、阿富汗人民

所有那些致力于本国稳定，人权和人道主义安全的阿富汗人都不会理解联邦国防军的撤出。在最好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的军队将取代联邦国防军，这样一来，损害将是有限的，人们将只会对德国人和德国的政策失望地摇摇头。

然而，更有可能出现的却是远为不利的情况，直至参加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各国的分裂，以及这一分裂将造成的更多国家撤军的后果。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西方将全部从阿富汗撤出，因为西方国家在德国积极参与下以团结的方式维护该国稳定的政治意愿将瓦解。这样一来，阿富汗将成为失败国家，沦为暴力地区和伊斯兰恐怖主义行动的地区，对于

伊斯兰恐怖主义来说，破坏巴基斯坦将不费吹灰之力。所有在战胜塔利班之后因为看到了更多自由与尊重的希望而松了一口气的那些人都将被抛回塔利班狂热宗教和政治统治下的痛苦生活中去。西方政策的可信性指数将在世界上所有那些蔑视人权和侵犯人道主义安全的国家降至谷底。

### 长期损害

这是一个虚拟的情况。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的是，正如某些军事专家所说，如果阿富汗形势发展的“螺旋式下降”<sup>4</sup>无法得到遏止和逆转时，虚拟式很快就将成为直陈式。

或许西方国家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之后不应当做出干预阿富汗的决定。然而，决定既已做出，就不能够简单地撤销。对于稳定一个应在尊重人权和人道主义安全前提下保持其自身文化的国家来说，不可能简单地放弃联合国的授权而又不使这些政治目标和那些标榜这些目标的人的权威受到长期损害。

<sup>1</sup> 奥巴马在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纽约时报，2009年3月7日。

<sup>2</sup> 福尔克尔·佩尔特斯（Volker Perthes）著：审查什么——决定向国外派兵的四项标准，法兰克福汇报（FAZ），2007年2月14日。

<sup>3</sup> 参阅威尔福里德·冯·布雷多夫（Wilfried von Bredow）著：德国的军事与民主，威斯巴登，2008年，第231页及下。

威尔福里德·冯·布雷多夫（Wilfried von Bredow）博士，马尔堡菲

力普大学政治学教授。

## 战争永远违反国际法 回应“反对：加沙的战争”

格哈德·富尔达（Gerhard Fulda）：战争从根本上来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吗？以色列的回答不是适当的吗？以色列无权封锁加沙吗？加沙的战争真地只是加强了本地区极端主义分子的力量吗？克雷门斯·维尔京（Clemens Wergin）在二月份的国际政治杂志上撰文对这些矛盾的问题进行了探讨<sup>1</sup>，结果是自相矛盾。

该文包含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在此，仅对其中最成问题的某些论点予以评论：

“战争有时候当然也会解决问题”，维尔京在文中写道。

在现行国际法的框架内，原则上支持或者反对战争是做不到的。在此，适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绝对禁止武力的原则，仅允许进行防御性战争，但绝不允许出于所谓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进行战争。在联合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规定当属第2(4)条，因此，吹捧战争的效用归根结底是支持废除联合国。

“从国际法角度来说，声称以色列在遭到40枚导弹袭击后不可以用80次空袭予以回击，(…)纯属无稽之谈”，维尔京在文中继续写道，此乃让以色列免遭过度使用武力的谴责的拙劣企图。

人道主义战争国际法的适度原则并不是将交战双方的牺牲进行抵消。相反，该原则要求在每次具体行动的预计军事目标的意义和不可避

免的平民伤亡人数之间进行权衡，严肃的批评指责以色列在这种审查过程中一再失灵。将法律上并不重要的40/80的比例关系同指责相比较并不能驳倒这一点。

援引“世界正义战争的道德哲学鼻祖”米歇尔·瓦尔策（Michael Walzer）恰恰是荒诞的。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正义战争”的理念便不再是使用军事武力的正当理由。

“战争是可怕和残酷的，因此， Hamas 任何时候都不应当首先挑起加沙的战争”，维尔京继续写道。

如此说来，是 Hamas 挑起了战争吗？事实上，以色列在进军之前就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威胁要采取行动，以色列同样担心政府想影响选战。在停火期间，导弹数量和伤亡者人数都大幅下降， Hamas 没有延长停火时间是因为以色列没有遵守该约定的核心规定。

维尔京认为，边界被关闭是 Hamas 的责任，因为 Hamas 没有放弃其消灭以色列的思想，也不承认奥斯陆条约的最低共识，最低共识的内容也包括停止修建以色列在奥斯陆会议之后大力推进的违反国际法的居民点。对 Hamas 的批评忽略了一点，即法塔赫和 Hamas 之间的意见分歧几乎与宗教分歧无关，而主要在于对以色列和平意愿的评判。法塔赫“承认以色列”，并且“放弃了武力”， Hamas 则指责法塔赫过早提供了巴勒斯坦人在谈判中唯一拥有的筹码。

维尔京认为， Hamas 将人民作为盾牌。然而，巴勒斯坦人抵御的是那些入侵其居住地区的坦克，难道应该让他们在很容易成为进攻目标的地方将卡森导弹的原始弹管装上炸药吗？从技术上来说，以军较其远具优势。对加沙地带的完全封锁是依靠军事武力实现的，违反了国际法，对此，巴勒斯坦人拥有自卫权，但不允许使用不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的武器。然而，如果有人出于人道战争国际法的理由而对此加以指责，他就完全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自卫权。或者人们真地认为必须向 Hamas 提供装备电子目标瞄准系统的导弹，使其能够集中于军事目标吗？不应忘记的是，卡森导弹大约 99% 落在了野外。

此外，对“法塔赫派总统阿巴斯为首的温和力量与 Hamas 奉行的恐怖战略”之间进行的区分也是陈词滥调，而且完全不符合事实。从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带的战斗部队的自我吹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停火期间发射的导弹分为三类，各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仍在该地区进行战斗的法塔赫（即所谓的“温和力量”）发射的，三分之一来自 Hamas 的军事组织，最后三分之一则来自较小的战斗小组。

维尔京将其论述归纳为以下几个论点：

--以色列表明，恐怖起不到作用，实行恐怖的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以色列重建了军队的威慑力量。

--以色列通过“压倒性力量”稳定了通往加沙边界的形势，以此给不断遭到失败的“以土地换和平”的和平理念最后一次机会。

这颇具讽刺意味。此外，为了证明“以巴冲突中的这一和平理念尚

未经历任何考验”，还举了下面的例子，即“以色列已经完全从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两次撤军对以色列的结果却都是其自己的领土再次遭到袭击。因此，经验告诉我们，应当明确反对‘土地换和平’的公式”。

以色列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军同为谈判而设计的“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之间有什么关系呢？2000年6月，以色列从“安全区”撤军时，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一公式。2005年8月，加沙地带被清空，那时以色列仍然拥有海空主权，采取了多次个别军事行动，实行全面封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谈得上清空的话，那么那也是一次单方面的行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土地换和平”的公式在西奈半岛经受了考验，但以色列还从未对巴勒斯坦人尝试过这一公式。

维尔京列举的例子并不能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以土地换和平”的解决思路已经失败了。不过，如果有人以如此引人误入歧途的方式反对至少在这场冲突中有些微机会获得和平解决的这一唯一的形式，就必须允许别人向他提出下列问题，即他为什么要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现代国际法于不顾，而要试图将战争辩称为一种政治工具。

近年来，特别可以从美国新保守派那里听到类似的论据。这些人拒绝人道战争国际法，将联合国束之高阁以及赞成为实现政治目标进行战争的权利，亦即支持强权的辩护词。

显然，这些理念触了礁，新保守派被证明是无能的而落选。现在，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德国外交中这一最为敏感的问题，必将激起愤怒

的反抗。

1、克雷门斯·维尔京 (Clemens Wergin)：加沙的战争，国际政治，2009年2月，第56-60页。

格哈德·富尔达 (GERHARD FULDA) 博士，继拉巴特，开罗和吉达之后任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大使。

## 被审判的地狱

### 红色高棉被推翻三十年之后，柬埔寨开始清算其罪行

托马斯·古奇科（Thomas Gutschker）：臭名昭著的吐斯廉监狱的负责人康克由（Kaing Guek Eav）作为第一名被告在一个新成立的法庭出庭受审。这是针对计划于2010年开始对四名波尔布特领导人进行的审判的预演，然而，将长期被遗忘的往事暴光将是艰难和令人痛苦的。

这一田园风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咯咯叫着四处乱跑的小鸡，鸟鸣，从一家学校里传来孩子们的声音。洞里萨湖畔，木制的渔船在正午炙热的阳光下摇曳，富饶的淤积地上，农民们用原始的工具在劳作。

钟屋纪念佛塔在金边以南，半小时的车程即到。这里本可以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地方，但它却是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无声见证物。1976年至1979年之间，红色高棉在这里杀害了17000人，这些人被打碎的颅骨被叠成了一座佛“塔”，严格按照年龄摆放。这座柬埔寨最著名的“杀人场”现在是纪念种族大屠杀的主要场所，那场大屠杀消灭了170万人，占当时柬埔寨全国人口的将近四分之一。

刽子手们的行径惨无人道。为了节省子弹，他们用硬竹棍杀死那些受害者，或者用棕榈叶锋利的边儿割断他们的喉咙。喇叭中传来革命的进行曲，用以遮盖临死者的叫喊声。在一颗树脚下，还堆放着不可能属于成年人的碎骨。在这里，小孩子也遭到杀戮，因为红色高棉是实行灭门的，他们的血腥口号是：“如果你想砍倒一颗树，就要连根除掉。”现

在，树干前的牌子上用大写字母写着“杀人树”的字样，就仿佛那是一种特殊的植物类别。

康克由一年前站在此处的时候，他跪了下来，合起双手祷告。以“杜赫”的名字而出名的这个人在红色高棉时代建立并领导了这座代号S-21的安全监狱—吐斯廉，钟屋塔的大部分遇害者都出自这座监狱。杜赫在法官陪同下外出停留了四个小时，他请求一位幸存者的宽恕，但遭到了拒绝。

二月中旬，开始对这个现年66岁的男子进行审判。三月底宣读的起诉书指控他犯下了反人类罪状，严重违反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和柬埔寨的刑法：奴役，强奸，酷刑以及谋杀。这不是未来数月将在金边开始审理的随便一个案子，因为在红色高棉独裁政权倒台三十年以及内战结束十年之后，杜赫是红色高棉领导人中第一个因其犯下的罪行而被追究责任的。审判触及了许多禁区，因为在柬埔寨，凶手和受害者毗邻而居，现政府许多成员当时站在共产党一方战斗。1998年通过军事政变而成为唯一首相的洪森（Hun Sen） 当时就担任过红色高棉花的团长。他同联合国就负责管辖的特别法庭的结构问题进行了长达七年的较量，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由柬埔寨法官和国际法官组成的独一无二的极为复杂的机构。对于该机构来说，目前这场审判是公开进行的第一次试验，同时也应成为计划于明年开始进行的大审判的一次预演。

到那个时候，坐在被告席上的将是政治局四位委员和波尔布特最重要的四位左膀右臂。他们是：农谢（Nuon Chea），头号思想家和“老二”，

前国家主席乔森潘（Khieu Samphan），前外长英萨利（Ieng Sary）及其夫人、前社会事务部长英蒂迪（Ieng Thirith）。他们无一例外地均矢口否认负有任何责任，认为法庭是非法的，而且毫无悔意。“我不是凶手，因此，你们不能起诉我，否则你们将在七层地狱受到诅咒”，英蒂迪在最近对其被捕进行审查时如此吼道。象其他三人一样，她也是2007年秋天被捕的，同1999年以来一直被关押的杜赫一起关押在特别法庭里。牢房是按美国标准修建的，为囚犯们准备了一台电视机和一个用以存放审判资料的保险箱，房门白天时是开着的。急救车随时待命，这些66岁至83岁之间的年事已高的犯人们定期在医院检查身体。

这同用以折磨犯人的吐斯廉监狱形成了再鲜明不过的对比，当年的囚犯宗梅（Chum Mey）难以压抑他对此的愤怒。审判杜赫之前，这位78岁的人再次来到他度过生命中最黑暗那段时光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作为纪念地和博物馆被保留了下来。他指着那间自己曾经呆过两个月的牢房，每天晚上，他都在等着被带走处死。那是一个四面是墙的小洞，小到他伸不直四肢，必须要躺着睡觉，牢房中唯一的陈设是一个可携式的金属便盆。

1978年11月，宗梅被押到这里来的时候，施刑的那些人已经摧毁了他的意志。“我被关押后，连续十二天十二夜遭到拷打，眼睛一直被蒙着”，这位脸上没有皱纹，一头银发的老人这样说道。杜赫的帮凶们用棍棒殴打他，用钳子将他的脚指甲拔下，将他的耳朵通上电流，“直至我眼冒金星，只听到连绵不断的喊杀声”。最后，他在审讯他的那些人准备好的供书上签了字，承认自己和其他一些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间谍。这位拖拉机技师从未与美国情报部门有过任何接触，这无关紧要。在S-21监狱，受害者们一直被折磨，直至他们屈从于折磨他们的那些人的狂想，然后他们就被杀死了。

宗梅得以脱逃这一命运，这得感谢越南人。12月底的时候，越南人攻入了柬埔寨，1979年1月初，他们已经打到了首都。有些看守逃跑了，留下来的看守把所有没法行走的犯人全部杀死，其余犯人则被带往钟屋塔方向。交火中，宗梅和其他六名男子成功逃脱，作为15000多名被关押在吐斯廉监狱的犯人中仅有的几名幸存者，他们逃离了这座地狱。

他们当中今天尚在世的四个人在审判杜赫时作为原告出庭。他感到痛苦的是，他自己的政府都没有向他伸出援手，他要依靠孩子们的施舍生活，一天连一个美元都不到。不过，九个月前，特别法庭设立了一个专门向受害者提供司法救济的部门，这个所谓的“受害者部门”迄今已经受理了2700份刑事指控，向杜赫一案中的94名共同原告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服务。“法官们修改了相关程序规则，因为受害者否则就无法发挥作用”，德国技术合作公司负责成立受害人部门的莫尼卡·吕克说。外交部每年提供150万美元的经费，用以支持国际刑事审判中的这一新事物。

### 澄清与发现事实

本案或许将持续半年，参与人数过多未必有利于审判效率。在审理间隙，共同原告不得不在观众席和用玻璃墙隔起来的法庭之间穿梭，因为那里只为他们和他们的律师设了十二个座位。但来自柏林的受害人律

师席尔克·施图岑斯基却指出了关键的一点：“共同原告能够有助于全面澄清事实，发现历史真相，在一个从未问过他们本人他们可能想要些什么的国家，这样做会带来相关人的解放。” 审判的客体变成了主体。

对于审判本身来说，最重要的首推那四位活着离开S-21监狱的受害人，以及作为证人受审的原看守。“我们将证明是杜赫本人建立并领导了这个制度”，于尔根·阿斯曼说，这位来自汉堡的检察官自2006年底以来作为柬埔寨首席检察官琪凉（Chea Leang）的顾问决定性地参与准备了这次审判。在本案中，关键在于证明杜赫个人的罪行。尽管杜赫在被爱尔兰的一名摄影记者揭发以后向当局自首，他也从未否认过吐斯廉监狱里发生的一切。但他同时又推卸着责任，认为自己只是执行了他直接接受其领导的政治局的命令。

杜赫的辩护团努力将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过去引向现在。“最重要的并非杜赫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都做了些什么，而是自那以后他做了什么。他是唯一认罪并请求宽恕的人”，里查德·罗杰斯说道。这位39岁的英国人参加了所有国际战争罪犯法庭的工作，现在是“辩护团”的团长。辩护部门的费用由联合国支付，该部门是与“受害者部门”相对应的一个部门。“对于犯下可怕罪行，但以后协助澄清事实并表示悔过的人来说，怎样才是适当的惩罚呢？这个问题必须由法庭来回答”，罗杰斯说。

幸存者和遇害者家属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杜赫流的眼泪再多，也无法同所有柬埔寨人的眼泪相比”，宗梅说。布孟三十年前同宗梅一起逃脱，他说得更为直白：“我期待杜赫被判处终身监禁。” 这将是三十

年监禁，是最高处罚。不过，专家们认为法庭将判处三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以为对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进行的审判留出余地。此外，审前羁押的十年也将折抵刑期，因此，杜赫完全可以期待重新回归平民生活。

### “开放心脏心术”

在第一次审判中，法庭的复杂程序和结构也必须证明自己。正式名称为“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所有机构均由柬埔寨人和国际代表组成，共有两名检察官，两名辩护律师，两名调查法官和三个混合法庭。尽管柬埔寨人总是多一名，但只有当至少一名联合国法官与他们站在一边时，本国法官才能形成多数，因此，大多数决定必须共同做出。

到目前为止，尚看不出法官之间有严重的失和。不过，该法庭自2006年年中成立以来，柬埔寨方面就一直受到批评。柬埔寨国内的法治和政治独立均很脆弱，此外，缺乏整整一代受过培训的法律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被红色高棉杀害，或者逃到了国外。“这是对开放心脏做的一次手术”，来自德国的起诉顾问于尔根·阿斯曼说。

尤为严重的是针对法庭行政办公室两名负责人提起的指控。柬埔寨籍的行政办公室主任西恩·维索斯和他的人事部门负责人乔·蒂武特据称曾强迫下属将自己的部分工资交给他们。在柬埔寨，这种“回扣”非常普遍，政府内部同样如此。去年，联合国对此进行了调查，但却没有公开其报告。根据法庭的规定，柬埔寨方面必须调查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但柬埔寨方面并没有进行调查。尽管如此，还是施加了压力：现在，人事主管已经离开了法庭，行政办公室主任四个月来“因为健康原因”

没有露面。二月，柬埔寨政府表示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反对裙带关系，但未见行动。

对于法庭的声望同样颇成问题的还包括有关缺乏政治独立性的指责。在杜赫案中的一些柬埔寨法官以前曾因做出对首相有利的判决而出头，这恐怕不会妨碍洪森对他的任命。而首席检察官琪凉则受到批评，因为她反对国际共同检察官对其他五人提起起诉的建议。难道这位检察官获得任命是因为政府首脑希望能够尽快而且没有痛苦地结束这次审判么？

琪凉在谈话中几乎没有努力消除人们的这种怀疑。“我想要公正”，她说，“但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也是我的工作。”这位在德国接受过教育的女法学家反唇相讥：国际社会早就知道红色高棉犯下的罪行，尽管如此，却容许其流亡政府在联合国代表柬埔寨，直至1992年，这是令人尴尬的事实。应当这样说：如果你们自己身处玻璃房，最好不要乱扔石头。洪森在同联合国进行的艰苦谈判中坚持成立一个设在柬埔寨的法庭，他也是这样进行论证的。鉴于柬埔寨人权状况不佳，法治落后，联合国专家们建议在柬埔寨以外的地方成立一个法庭。最后，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混合法庭。

莫非该妥协是一个错误的机构吗？克努特·罗桑豪克（Knut Rosandhaug）是联合国派驻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他曾一度被此问题困扰。一方面，他认为法庭的资金来源是个不能重犯的错误。“不能仅仅因为没有钱了，就对正义打折扣。司法不能依赖于出资人的恩赐”，这位挪

威人说。柬埔寨政府总是迟迟不支付相关费用，这显然是应对在诸如反对腐败等问题上的政治压力的一种手段。当然，联合国成员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由于没有强制性的会费规定，罗森豪克不得不经常求乞。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募得1亿4千3百万美元，德国拿出了550万美元。象其他出资国一样，柏林也将继续提供资金同更加有力地打击腐败挂钩。

但另一方面，罗森豪克认为金边法庭并没有失败。在他看来，如果能够弥补其不足，该法庭甚至能够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如果政府想澄清罪行，但又担心国家法庭的高门槛，那么现在就可以选择这种辅以国际帮助的国家解决模式。”这位联合国外交官举了缅甸和泰国这两个邻国为例子，他意味深长地表示，“这两个国家有足够多的材料”。

“我欠他们的”

对于柬埔寨来说，这几个月其实是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清算，有点儿类似纽伦堡战争罪行审判，虽然两者之间的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差异。1979年红色高棉垮台后，大批干部自首，1998年波尔布特去世后又掀起了第二轮自首高潮，这一切都是通过对其罪行保持沉默而换来的。尽管所有英语出版物均对这些罪行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但柬埔寨的中小学生在历史课本上对此了解得却极少。吐斯廉监狱博物馆和钟屋塔的参观者主要是外国人。

伯克利大学最近所做的一项调查证明了这一集体被动。尽管80%的柬埔寨人在2008年秋天进行的一次调查中认为自己是红色高棉的受害者，但差不多有同样多的柬埔寨人认为政府更应当关注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而不是关注过去的罪行。柬埔寨是亚洲继缅甸之

外第二穷的国家，邻国的繁荣几乎没有对柬埔寨民众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大多数人依靠原始农业生存，许多儿童营养不良。金边法庭鲜为人知，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能够说得出五名被告的名字。

杜赫受审拉开序幕或许会改变这种状况。“人们开始再度议论起红色高棉时代”，阿斯曼检察官说。审判进行了电视转播，人们极为关注开庭的情况。“拖延了如此长时间以后，几乎没有人认为还会走出这样一步，并且首次尝试着结束不受惩罚的状况”，受害人律师施图岑斯基说。

审判是不是将已经愈合的伤口再度撕开？这位来自柏林的女士在谈到她的当事人时说，终于能够开口讲话是非常痛苦的，但同时也有人解脱。面带苦涩而友好笑容的宗梅老人说：“我代表着将近两百万被害者的希望。我必须代表他们为法律与正义而斗争，我欠他们的。”

托马斯·古奇科（THOMAS GUTSCHKER），博士，波恩莱茵周报外交版主编。

## 以牺牲大众为代价培养精英？

### 论精英，机会平等和国外经历

教育大辩论已经全面展开，专家意见、好的建议和批评不胜枚举。国际政治杂志邀请到六位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年轻一代的代表，就生活经历和事业压力进行讨论。这是一次视角的转换。

*国际政治：您认为什么是“精英”？*

托尼：我对精英这一概念有着矛盾的看法。我认为，有必要提及精英社会学，因为我们要思考如何在一个国家挑选出各个领域的领导力量。但是德国就精英问题展开的讨论事实上与此基本上不相关，这是令我困惑的地方。在德国，更多是把精英作为一个标签和自我归类的一个标准，而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过程进行研究。

*国际政治：图宾根，巴黎政治学院，牛津——尽管你对“精英”标签持批评性态度，但你仍然决定在那些明确主张自己拥有这一标签的大学就读。为什么？*

托尼：我在接受这次采访之前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我觉得这就好比是行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脊上，一方面，人们接受有些大学比其他大学给你带来更多可能性这一点，但另一方面，又持批评性态度，不会躺在“我现在是精英了”的想法上睡觉。

海珂：你说你自己的话是自相矛盾的，但我认为，这正是精英所应具备的特点，即每天都有批评性的自我反射。此外，至少在讨论教育精英时，我们首先得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教育？”接着还要再提出“什么是培养？”的问题。在德国，洪堡的教育理想与培训不同，尽管这两者当

然是平行的，也就是说，我必须接受过高等教育才能接受高水准的培养。如果每日新闻中说“我们必须投资于教育！”，这是指增长，它首先同教育无关。将教育视作增长，视作国内生产总值，视作从国民经济的角度创造财富，这些并不是一回事儿，尽管它们或许相互关联！

祖扎娜：那么，在法国政治学院毕业后真地立刻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吗？

赫尔曼丝：面试时，所有大门都会因政治学院这个标签而向你打开。我自己也曾经试图跻进名牌大学的体系中，参加了辅导班，就是说两年的时间里疯狂地为“竞考”而苦读，最后还是没有成功（笑）。我们那个组有三个人拿到了联邦助学金，但全部落榜……布迪厄早就说过：在法国，能够获得成功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些拥有巨大社会资本的人，象是部长、律师和医生等的孩子。这个系统是封闭的，只不过法国人都不会说出来。口头上是说“人人都有机会，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也有机会”，但现实却是另外一回事儿。

伊娃：我感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精英获胜，大众失败。只是，由谁来定义精英？归根结底，是各个大学。在大学里，对人进行培养，这些人有意识地将自己视为精英。这些人反过来又将那些与自己相似的候选人挑选出来。问题是，挑选的标准是什么？

*国际政治：海珂，你是德国人民高校基金会筛选委员会的委员。你特别看重什么呢？*

海珂：当然，我们有一份审核的标准目录。包括分析能力，专业能力，交际能力等方面，当然，每个人如何权衡这些分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本人是学企业经济学的，你们难以相信有多少人“热心社会事务”，他们从事某项社会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将这段经历写在自己的履历中，不过，我们较快就能够看出来他们是否有内在的主动性。此外，人

品无疑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很难用语言对人品加以描述。有时候，你就有种感觉，觉得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候选人！就是这样，如果三个委员都这样看，或许就存在某种“客观的反感”（笑声）。

*国际政治：流动性和国外经历有多重要？*

海珂：国外经历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人们期待的是流动性，当然，我们会努力判断相关人员是否出于内在驱动力而流动，因为现在所有人“都不仅关注自己”，正如所有人都受过“跨学科”教育一样。这是不断被人们挂在嘴边儿的话，在面试中，在招标中都是这样，我觉得这很可怕，这特别使得出国留学对那些在大学攻读企业经济学的人来说成了一种正常的义务。我们必须设想一下，到国外去的义务！这是什么意思呢？要么是我有出国的需要，因为我很好奇，要么就是我必须被迫出国吗？

*国际政治：阿斯米塔，美国大学生的流动性同欧洲人相比又是怎样的呢？人们是怎样“超越自我”关注大西洋彼岸呢？*

阿斯米塔：嗯，美国比欧洲要大得多，从这一点上来说，那些从美国一端到另一端去念书的大学生们就好比是横穿了欧洲，因此，恰恰在精英大学这方面，流动性问题在我们美国不是很突出。关于外语，在中小学的时候，就要求我们学习语言，可惜课程的质量极差。所以，尽管我们可以把动词的变位掌握得很好，但该说话的时候却张不开嘴。即使是斯坦福大学的语言班也很可笑，不过，由于英语被视作通用语言，情况并无改观。

*国际政治：在你们国家，也象德国这样对教育和精英概念展开了如此激烈的争论吗？*

阿斯米塔：美国并不争论精英还是非精英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很简单，那就是常青藤大学联盟就是精英大学，如果你在其中一所大学念，那

你就是精英。不断有人在提醒我们，斯坦福是全美最棒的五所大学之一，不过我觉得，我们也在利用这种精英思维。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去参加面试，我们很信赖我们是斯坦福大学学生这个事实。在美国，有份量的人不是哈佛毕业，就是毕业于耶鲁，普林斯顿，或者斯坦福。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美国才没有讨论精英问题，因为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如此成功，只是因为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因为说到底，这只是一个互拍肩膀的高校毕业生的精英俱乐部。

伊娃：立陶宛也基本上没有精英讨论，不过原因有所不同。所有人都可以在国立大学读书，我们那里提供奖学金的基金会也很少，大部分学生都是贷款。如果你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优秀再加上勤奋，而且目标明确。可惜，立陶宛需要慢慢理解除了念大学之外，经历一些其他的事情也可能丰富人的阅历。我念了五年法律之后，决定在爱尔兰和无家可归的酗酒者一起工作一年，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她疯了！”

祖扎娜：我觉得，恰恰是在象立陶宛或者斯洛伐克这样的小国，流动性和语言极为重要。斯洛伐克只有五百万人口，我们必须得走出去，否则是不行的。布拉迪斯拉发一半的大学生在维也纳读书，另一半在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

*国际政治：如何才能不让这些人流失到国外呢？*

祖扎娜：我觉得，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回国最重要的动机无疑是家庭。人们出国几年，但还会再回来的，事先就知道这一点。当然，也得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恰恰最近几年来，我们经历了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因为许多投资者来到斯洛伐克，甚至大力吸引在国外生活的斯洛伐克人回国。不过，在科学研究领域让人们回国就比较困难，那些人或许再也不会回来了，这种情况很难避免。大部分人到了美国，德国也同样如此。

*国际政治：美国大学成功的秘诀何在？*

阿斯米塔：首先，我们有极为充足的资金，教授和大学生都是如此，事实上，所有重要的私人出资者都投资于斯坦福。不过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对于许多外国留学生来说，美国仍然代表着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国家。例如，加利福尼亚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特别是亚洲人。此外，我本人也是人才外流者的后代，我父亲当年离开了印度，因为那里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机会。现在，我在斯坦福读大学。我认为，美国大学的这种多样性和对世界所持的开放性态度也使得美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例如，自从我来德国以后，不断受到我自己认同性的困扰，在这里，介绍我的时候，人们总是说“这是我们来自印度的同学”，虽然我是美国人。而在美国的时候，我的肤色从来都不重要。

赫尔曼丝：与美国大学的资金相比，欧洲还处在中世纪。我曾在杜克大学呆过一个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流的图书馆，小型活动，有趣的郊游，他们就是很有钱，但大学生们的期望值也有所不同。在美国，成为大学生就是一个主要的职业，人们就生活在校园中，不外出，夜晚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不过，这当然也就提出了下列问题：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是想在远离“真正生活”的一个微观宇宙中度过五年时光吗？

祖扎娜：我去过哈佛附近的塔夫斯大学，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在一起呆的时间长得多，经常见面，多数是在学习的时候。在美国和斯洛伐克，2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在德国，这却是个很大的问题，在这里，一切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除了上大学，大家还做其他的事情，等毕业的时候都已经27、8岁了，这是浪费时间。

海珂：引进学士和准硕士学位正是想尽可能地缩短学时。当然，我的看法是，这或许有利于大众，也有利于国民经济，但却是以牺牲顶尖人才为代价的，因为如果没有出勤规定和学校制度的话，这些尖子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侧重点。在德国，校园式大学越来越多，这些大学当然都给自己打上了“精英”的烙印。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当然都非常棒，也能得到很好的

职位。不过我的问题是，如果让这些拥有更多的自由，这些拥有高潜质的人是不是会更有用。因此，至少就学士在德国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很成问题。在德国，我们经常会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以谁为标准？

*国际政治：你对德国高等教育有何建议？*

海珂：德国存在着一个情结问题，在个体层面上，资助的想法很不普遍。在大学里，人们处处碰壁，即使你很优秀，要想获得资助，也得靠运气。德国人总是面临着竞争压力，教授之间有压力，他们不愿意引用对方的话，大学生之间则是攀比分数与成绩，因为我们的的大学生人数过多，所以才如此。再加上现在的经济危机，整个气氛就是不愿意去资助。

赫尔曼丝：如果你这样看德国的话，那我又该怎么看法国呢？或许必须改进德国的体制，但没有哪种体制是完美的。尽管我还在读硕士，但我觉得德国大学的自由很理想，所以我也对学士头衔持批评性态度。此外，我并不觉得德国大学生得有运气才能获得成功，只要有志向，又肯努力，每个人都能成功。我恰恰觉得德国大学的师生关系没有等级，这里没有紧闭的门。在法国，教授就是怪人，他们在走廊里碰到自己的学生连声招呼都不会打。因此，我认为，德国应当为自己的体制感到骄傲，因为这种体制仍然提供了许多自由，特别是对精英来说，这种自由是很重要的。

托尼：海珂，我想用盎格鲁萨克逊的方式做个回复：“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笑）。我不认为德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对精英的资助，1968年以来，德国的教育政策从未象现在这样大力资助精英。在我看来，问题在于另外一个层面：在德国，我们很长时间一直认为有一种“全能的综合性”大学，也就是适合一切人的模式。我个人认为，洪堡的教育理想，也就是研究与教学的结合尽管很有吸引力，但对于那些只是想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来说却并非正确的选择。大学应当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自由决定他们想以何种方式培养哪些人，是那些只想胜任一份职业的人，

还是用先前的话来说“超越自我”的人，不断对自己的行为提出质疑的人。我们应当让那些想搞研究的人去搞研究，让那些想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坚持办适合所有人的大学，如果这样，我们就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精英不应成为标签，这是托尼·维斯的看法。他今年26岁，在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非洲处工作，曾在图宾根，柏林，巴黎和牛津攻读国际政治。

伊娃·萨布洛芙斯卡，29岁，在立陶宛获得欧盟法律博士学位，欧洲与我网络杂志创办人之一。在里加和柏林学习之后，她与无家可归的酗酒者一起工作了一年。“所有人都认为我疯了。”

祖扎娜·米库拉索娃，31岁，先后在布拉迪斯拉发，因斯布鲁克，苏黎世和巴黎攻读经济学和营销。“在一个小国里，流动性和语言极为重要”，这位供职于经济部的斯洛伐克女子说。

阿斯米塔·库马尔，20岁，2006年起在斯坦福学习电气工程。这个年轻的美国女孩儿不理解她的德国同事面临的“精英困境”。在她看来，斯坦福是世界上一流的学府之一，谁在那里念书，谁就是精英，就是这么简单。

海珂·里希特，26岁，认为引进学士学位颇成问题。他毕业于曼海姆，专业是企业经济学，后在澳大利亚呆过一年。目前在柏林攻读法律，是大学基金会筛选委员会成员。

赫尔曼丝·格雷蒙，26岁，有意不在祖国上大学。“在法国，教授们都是怪物！”2005年以来，她一直在柏林的洪堡大学攻读文学与历史。